

六朝家書研究

譚家健

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

我國最早的家書見於戰國末期，¹兩漢已有一批名作流傳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由於社會的動亂，親屬之間聚散無常，互通音問比太平時期更為迫切，家書隨之激增，現存數量大大超過漢代。研究這個時期的社會思想，學術文化，語言文學，不能不注意家書。

悅親戚之情話：豐富的文化內涵

家書內容包羅甚廣。最主要者首先是為人處世齊家治國之道，其中許多真知灼見，體現了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或生活中的切身經驗。

如諸葛亮《誠子書》〔清嚴可均校輯《全三國文》（1958年1版）卷59頁1374〕，主張以「靜」與「儉」作為修身養性的基本原則，特別強調「廣才」、「成學」、「治性」三者的辨證關係。「靜以養身，儉以養德。非澹泊無以明志，非寧靜無以致遠。夫學須靜也，才須學也。非學無以廣才，非志無以成學。」後來，「澹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」，成為傳頌千古的格言，至今仍被許多人當成座右銘。

西晉名將羊祜有《誠子書》（《全晉文》卷40）提倡言語行事務求恭謹，「恭為德首，慎為行基。願汝等言則忠信，行則篤敬。無口許人以財，無傳不經之談，無聽毀譽之語。聞人之過，耳可得受，口不得宜。」

王修教子珍惜時間，「日月可愛也，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。」「時過不可還，年大不可少。」姚信要求兒子言行一致，表裏如一，「舍偽從實，遺已察人。」向朗要求家族和睦，兄弟間「唯和為貴」。王祥、書琮等人提倡儉，葬，反對厚殮。……這些見解，至今仍然具有積極意義。

有些開明的王公貴族，向子弟講述治國之道。如十六國時西涼武昭王李暠，其《手令誠諸子》（《全晉文》卷155）要求：「詳審人，核真偽，遠佞諛，近訟訴刑法，所應和顏任理，慎勿以情輕加聲色。賞勿漏疏。罰勿容親。……禁御左右，勿作威福。勿伐善施勞，逆詐憶比，以示己明。廣加咨詢，無自專用。從善如順流，去惡如探湯。」李暠治

1 如秦戍卒家書，見《云夢睡虎地秦簡》，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。

涼頗有政績，信中所總結的是切身體會，是可以當作《官箴》來讀的。他另有《述志賦》，可與家書參看。

有的家書旨在傳授官場訣竅，雖然是為了長保富貴，但也不無可取。如北魏楊椿出身大官僚家庭，他本人四歷九卿，十任刺史，累官至侍中、尚書。他歸納畢生秘訣為一個「慎」字。晚年所作「誡子孫」（《全後魏文》卷41）中談到：孝文帝即位之初，楊氏兄弟三人並居近職，兄偉侍從皇帝，楊椿與弟在太后左右。時帝尚幼，太后掌權，提倡告密，十日一報，否則訓斥。太后與皇帝不和，有人便在中間傳小話。楊氏兄弟互相告誡：「今忝列二聖近臣，母子間甚難。宜深慎之。又列人事，亦何容易？縱被嗔責，慎勿輕言。」當時受過太后呵斥，後來終於得到皇帝誇獎。楊椿由此叮囑兒孫：「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，宜深慎言語，不可輕論人惡也。」這封信內容很豐富，其中心部把伴君如伴虎的惴惴心態寫得十分傳神。

有的帝王家書把統治者的南面術概括成一個「密」字。如宋文帝劉義隆給弟弟江夏王劉義恭的信反覆申述：「凡事皆應縝密，亦宜豫敕左右，人有至誠，所陳不可漏泄，以負忠信之歟也。古人云，人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。或相讒構，勿輕信受。每有此事，當善察之。」（《全宋文》卷2）這樣的王霸之道，在公開的書信中是少見的。

有的家書反映了正史所不曾記載的政治鬥爭和官場腐敗情況，如王導《與從兄王含書》，庾翼《報兄庾冰書》。有的討論如何選拔人才，如劉景安《致舅父崔亮書》。有的談論軍事如諸葛亮《與弟諸葛瑾書》、庾肅《諫叔父徙襄陽書》。可補正史之不足。

第二、有一部分家書，細敘家庭瑣事，充滿閑情逸趣，是了解六朝社會面貌和人情世態的第一手資料。

梁丞相徐勉，為官數十年，以清廉勤政著稱，不受賄賂，不置產業，以清白傳子孫。《誡子崧書》（《全梁文》卷50）是他自述思想情操的一篇名作。其中寫道：「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貧素，至於產業之事，所未嘗言，非直不經營而已。」「顯貴以來，將三十載，門人故舊，亟薦便宜。或使創辟田園，或勸興立邸店，又欲舳艫運致，亦令貨殖聚斂，若此事眾，皆拒而不納。」可見當時官吏兼營農業、旅店、運輸業、商業的風氣很盛，而徐勉卻有便宜不佔。信中講述他中年修築園宅的經過，目的「非存播藝以要利，正欲穿池種樹，少寄清賞」，又因為兩個孩子該結婚了，原來房子太小，容不下，必須讓他們有個住處，於是先在宅邊空地，築別墅數間；後來又在東邊建二宅，乃借二兒子從南邊帶回來的錢，猶不敷用，只好把郊圃一處賣給韋姓，乃獲百金，方才建成。經過歷年經營「桃李茂密，桐竹成蔭，塍陌交通，渠畝相屬。華樓迴榭，頗有臨眺之美；孤峰叢薄，不無糾紛之興」。最後談到自己從來不關心產業，現在要把營造園舍的始末告訴兒子。今後年高體弱，該休息了，凡家務田宅，一概不問。這封信寫得十分真率，娓娓動聽，口吻宛如田舍翁與兒孫交家底。此老之天真純實躍然紙上。比起當時的田園詩、山居賦，另是一番風味。

最有趣的是陳暄《與兄子秀書》（《全陳文》卷16）。陳暄是陳後主的狎客，率性通脫，文章談諧，語言不節。後主親昵而輕侮之，終被殘害致死。暄嗜酒如命，其兄子陳秀致書友人何胥，婉有諷勸。陳暄作書回答說：「吾既寂漠當世，朽病殘年，產不異於顏原，名未動於卿相，若不日飲醇酒，復欲安歸？汝以飲酒為非，吾不以飲酒為過。昔周伯仁渡江，唯三日醒，吾不以為少。鄭康成一飲三百杯，吾不以為多。然洪醉之後，有得有失。成廝養之志，是其得也；使次公之狂，是其失也。吾常譬酒之猶水，亦可以濟舟，亦可以覆舟。故江諮議有言：酒猶兵也，兵可千日而不用，不可一日而不備。酒可千日而不飲，不可一飲而不醉。美哉江公，可與共論酒矣。……吾生平所願，身沒之後，題吾墓云：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。若斯志意，豈避南征之不復，賈誼之慟哭者哉！何水曹眼不識杯鐺，吾口不離瓢杓。汝寧與何同日而醒，與吾同日而醉乎？政言其醒可及，其醉不可及也。速營糟邱，吾將老焉，爾無多言，非爾所及。」這篇妙文，比孔融《勸曹操禁酒令》更滑稽，比劉伶《酒德頌》更深沈。清末民初王文濡指評此文說：「文過飾非，其舌可畏。妙語解頤，層出不窮。讀之如見其醉態矍矍，使酒罵座之時。舍人論文，於今猶有酒氣。」（王文濡選註《南北朝文評注讀本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1981年）第二冊頁7-8）這封信表面上看是戲謔之言，與六朝談諧雜文風格有些相似；其實他是借酗酒以自我麻醉²，借家書以自我調侃，曲折地流露他窮困潦倒，屈居下僚，位同俳優，痛苦無處排洩的牢騷，乃至自甘沉淪的變態心理，極可憐又可悲。

不少家書，帶有特殊的幽默感。如吳虞《與弟書》，為子覓媳，不求高門大戶，「造求小姓，足使生子。天其福人，不在舊族。揚雄之才，非出孔氏之門。芝草無根，醴泉無源。家聖受禪，父頑母嚚，虞家世法出癡子。」最後三句，把自家與虞舜父母及其子商均、弟眾相聯繫，是拿姓氏開玩笑。晉孫琮《與弟孝征書》，認為養鴿無害。緣春秋時衛懿公好鶴，民無役車而鶴有乘軒，當然要招致敗亡。反之，像周文王政治修明，雖築靈台神詔，養文魚素鳥，與民同樂，有何不可？這是以反語刺世諷俗。吳李衡家書提倡種桔，稱為「木奴」。晉謝立家書大談垂釣烹魚之樂，皆清新活潑，生動有趣。

夫妻書信，以東漢秦嘉及妻徐淑伉儷互致最有名，六朝無可比匹者。東晉王獻之臨終前給前妻鄒氏的信，婉轉敘說被迫離婚與公主結婚，並沒有得到幸福，心中無限懺悔。只有十來句，沈重悲切，但文采不及秦嘉。南齊王肅先與謝氏結縭，後因禍奔魏，與皇帝之妹結婚。謝氏得知，致書王肅，回憶當初恩愛及別後思念，遙祝新人幸福；自念心灰意懶，決意遁身佛門。其信駢散兼用，語言優美，情調纏綿，比內容相似的東漢竇玄妻致夫書更具感染力，信末附四句五言詩，以蠶絲雙關相思，蘊藉尤深。

第三、有些家書討論學術文化、文學藝術問題，在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價值。

齊王僧虔《誠子書》（《全齊文》卷8）是研究六朝玄談的重要文獻。信中談到他酷愛玄

2 參看王瑤《中古文學史論》，198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版，《文人與酒》。

學，「見諸玄、志為之逸，腸為之抽。專一書，轉誦數十家注，自少至老，手不釋卷，尚未敢輕言。」他告誡兒子，「汝開《老子》卷頭五尺許，未知輔嗣（王弼）何所道，平叔（何晏）何所說，馬（融）鄭（玄）何所異，指例（《老子指例》）何所明，而便盛於塵尾，自呼談士，此最險事。設令袁令（袁甫）命汝談《易》，謝中書（謝安）挑汝談莊，張吳興（張融）叩汝言老，端（真的）可復言未嘗有耶？」這些話提供了當時玄談的主要著作和人物情況。又說：「談故如射（射覆，猜物），前人得破，後人應解，不解即輸賭矣。且論注百氏，荊州（指殷仲堪）八表，又才性四本，聲無哀樂，皆言家口實，如客至有設也。……汝曾未窺其題目，未辨其指歸。六十四卦，未知何名，莊子眾篇，何者內外？八表所載，凡有幾家？四本之稱，以何為長？而終日欺人，人亦不受汝欺也。」這段話記錄了當時玄談的中心議題和辯論方法。深受哲學史家重視。

宋范曄《獄中與諸甥書》（《全宋文》卷15）是這位歷史學家臨刑前所作，縱論文史哲藝各方面的體會。中心部分是談史書寫作，對自己的《後漢書》十分喜愛。「吾雜傳論，皆有精意深旨，既有裁味，故約其詞句。至於《循吏》以下，及《六夷》諸序論，筆勢縱放，實天下之奇作，其中合者，往往不減《過秦》篇。嘗共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。……贊是吾文之杰思，殆無字空設，奇變不窮，同含異體，乃自不知所以稱之。……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，諸細意甚多。自古體大而思精，未有此也。」如此自我誇獎，實屬罕見。引起古人不少批評，也有人認為並不過分。錢鍾書說，班書之贊確不如范書之論，「縱衡馳騁，感慨飛揚，後來洵為居上。」「傳則范遜於班多多。」所謂「無字虛設」是太誇大了。³ 范曄是中國文化史上兼擅文史書法音律醫術的全才，音樂演奏方面很有水平。他恐怕獲罪之後世人不能理解，所以在永訣之際，借與親屬通信，「稱情狂言」，盡情抒發，唯恐其心得不得傳，這正是家書的特殊功用所在。

西晉陸雲有致兄陸機書三十五通（見《全晉文》卷102），其中有不少關於文學批評的意見。他說：「雲今意論文，乃好清省。……意之至者，乃出自然。」所謂「清」，指明淨中有深情遠旨；所謂「省」即尚簡約去繁濫。信中稱讚陸機《述思賦》「流深情至言，實為清妙」，《漏賦》「可謂清工」。批評《答少明詩》「亦未為妙，而省之如不悲苦，無惻然傷心言。」《丞相箴》「不如《女史箴》清約耳」。批評王粲某些賦「平平」、「不得言情」、「辭不為偉」。「蔡氏（邕）所長，惟銘頌耳。銘之善者，亦復數篇，余平平耳。」他把自己的文章請陸機修改，可以看出兄弟之間切磋琢磨的情景。劉師培稱讚「雲集《與兄平原書》，其中數首於陸機文批評極當，尤宜參考。」⁴ 錢鍾書說陸雲：「無意為文，家常白直，費解處不下二王雜帖。甚九論文章，着眼不大，着語無多，詞氣殊肖後世之評點或批改，所謂『作坊或工房中批評』也。」⁵

3 錢鍾書《管錐篇》第四冊，第1279頁，中華書局1979年版。

4 劉師培《中國中古文學史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頁。

5 同注3，第1215頁。

梁蕭統、蕭綱、蕭繹兄弟間的書信，常討論文學。蕭綱誠其子當陽公大心書中提出：「立身之道，與文章異。立身先須謹慎，文章且須放蕩。」指大膽想像，並非行為放蕩。在《與湘東王書》中，蕭綱指出，當時文壇一味擬古，導致「文體儒鈍殊常」，「既殊比興，正背風騷」。「未聞吟詠情性，反擬《內則》之篇；操筆寫意，更摹《酒誥》之作。遲遲春日，翻學《歸藏》；湛湛江水，遂同《大傳》。」這段話可為「放蕩」作注腳，可見其所批評的對象主要是玄言詩。蕭綱很強調作家的個性和創造力，既不贊成模仿古人，也不贊成學步今人。「謝客（靈運）吐言天拔，出於自然，時有不拘，是其糟粕。裴氏（子野）乃是良史之才，了無篇什之美。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，但得其冗長，師裴則蔑絕其所長，唯得其所短。謝故巧不可階，裴故則不宜慕。」對裴的批評是符合實際的，對謝的評價有人認為失當。蕭統《答湘東王求文集及《詩苑英華》書》談到文與質的關係並自述其文學創作的背景與感興之由。在《答晉安王書》中談自然景物與文學創作的關係，反映了當時自然審美的自覺。

吐率意之心聲：親切的表述語言

魏晉以降，書信寫作很受重視。劉師培指出：「當時人士於尺牘書記之屬，詞有專工。」⁶不少文人精心結撰，辭采斐然，堪與詩賦比美，愈到後來，愈加駢偶化。但家書的語言，則仍以淺白樸素為主流，率意寫來，不加雕飾。大多數是通俗文，少部分是古文，個別的用駢體或亦駢亦散。

魏文帝曹丕《典論·太子》篇談到家書之難：「上書自陳，欲系辭博稱，則父子之間不文也；欲略言真說，則喜懼之心不達也。里語曰：『汝無自譽，觀汝所作家書。』言其難也。」意謂兒女致信父母，如果講究辭藻典故，則父子之間何必掉文？如果簡單直陳，則複雜的感情無法表達。這的確是有矛盾。錢鍾書說：「唐前遺篇，『不文』『直說』，堪當家書之目者，以《全晉文》卷十七廢太子遹《遺王妃書》為最早，次即《全北齊文》卷九《為國姬與宇文護書》。」⁷這兩封家書的語言的確特殊。

晉惠帝子司馬遹，庶出，以長立為太子。皇后賈氏嫉之，設計陷害，矯命逼太子飲醉，令其抄寫篡位弑君文告，太子因而廢為庶人。司馬遹在獄中致書賈后，辨其冤曲。其中寫到：「二十九日早，入見國家（皇帝）。須臾，遣至中宮（指賈后）。……中宮遙呼陳舞（宮女名）：『昨天（指父親）教與太子酒棗。』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，使飲酒噉棗盡。鄙素不飲酒，即便遣舞請說不堪三升之意。中宮遙呼曰：『汝常陛下前持酒，可喜，何以不飲？天（父親）與汝酒，當使道文差（病癒）也。』便答中宮：『陛下會同，一時見賜，故不敢辭，通日（平時）不飲三升酒也。且實未食，恐不堪。又未見殿下，飲此或致

6 同注4，第101頁。

7 同注3，第1512頁。

顛倒。』陳舞復傳語曰：『不孝哪！天與汝酒飲，汝不肯飲，中有惡物耶？』遂可（答應）飲二升，余有一升，求持還東宮飲盡。逼迫不得已，更飲一升。飲已，體中荒迷，不復自覺。須臾，有一小婢持箱來，云詔使寫此文書。鄙便驚起，視之，有一白紙。催促云：『階下停待。』又小婢承福（婢女名）持筆墨黃紙來，使寫。急疾不容復視，實不覺紙上輕重。父母至親，實不相疑。事理至此，實為見誣，想眾人見明也。」信中不少語詞顯然是當時口頭語，如「見與」、「即便」、「通日」、「停待」等。呼父為「天」亦當時習慣。六朝人以通俗文紀事，唯此信及任昉《奏彈劉整》所記兄嫂打架爭吵案情最為典型，是研究近代漢語的寶貴資料。此文技巧並不高，甚至有些重複囉嗦，但卻把賈后施加淫威故設陷阱的前前後後寫得明明白白，簡直像公堂面訴的口供。不久，廢太子終於被賈后害死。

宇文護是北周創立者宇文泰的侄子。在戰亂中，宇文護與母親閭氏分散，各處東西。二十年後，宇文護成為北周實際統治者，打聽母親下落，得知在北齊，遂發兵攻齊。北齊允許閭氏回周，並讓宇文護四姑楊氏先歸。閭氏託人口述一信給宇文護，細述當年逃難分別景況和想念之情。「吾與汝別之時，年尚幼小，以前家事，或不委曲。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，大者屬鼠，次者屬兔，汝身屬蛇。鮮於修禮起日，吾之闔家大小，先在博陵郡住，相將欲向左人城，行至唐河之北，被定州官軍打敗，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。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，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，並吾與汝六人，同時被擒捉入定州，……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，悉送向京。吾時與汝，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，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，茹茹奴望見鮮於修禮營火，語吾云：『我今走向至本軍。』既至營，遂告吾輩在此。明旦日出，汝叔將兵邀截、吾及汝等還得向營。汝時年十二，共吾並乘馬隨軍，可不記此事緣由也？」從這一節可以看出兵荒馬亂中如何當俘虜，如何逃難，流離失所的情狀。從姓名中可看出當時各民族已互相通婚。信中接着寫：「於後吾共汝在愛陽住，時元寶，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，博士（指教師）姓成，為人嚴惡，汝等四人、謀欲加害。吾與汝叔母等聞之，各捉其兒打之。唯盛洛無母，獨不被打。其後，爾朱天柱亡歲，賀拔阿斗泥在關西，遣人迎家累。時爾叔亦遣奴來富迎奴及盛洛等。汝時着緋綾袍，銀裝帶，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，黃綾裏，並乘驛同去。盛洛小於汝，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。如此之事，當分明記之取？」將分別時一點一滴，記得多麼真切，講得多麼動情。宇文泰事母至孝，讀書未竟，悲慟欲絕，馬上揮毫作答，亦為通俗口語，情真意摯，催人淚下。錢鍾書評閭氏書說：「此篇之體為『書』，則『文』也。其詞直說不文，則『筆』也……雖非錯比藻翰之文，而自是感蕩心靈之文。筆雖非女而可為文，此篇堪示其例。歐陽修嘗言『晉無文章，唯《歸去來辭》』。竊欲言，北齊無文，唯《閭姬與宇文護書》，可乎？」⁸ 充分肯定通俗文體同樣具有文學價值。

帝王詔誥通常用古文，然而與子弟的密詔卻多用口語，宋帝諸詔即是。明帝之弟巴陵王劉休若有謀反狀，明帝召還，令其自裁，對外宣稱猝死。為此詔告休若胞弟桂陽王

劉休范，說明情況。信中寫道：「外間有一(巫)師，姓徐名紹之，狀如狂病，自云為塗步郎(神名)所使。去年三月中，忽云神語道，『巴陵王應作天子，汝使巴陵王密知之，』……巴陵具知，『云莫聲，但聽。』……休若在西，廣召弓馬健兒，都不啟聞。又戾道明等，昔親力賊，罪應萬死。休若在西，大信遇之，乃潛將往，不啟京。……心迹既不可測，因其還朝在第，與書，事事詰詰。於內許密自引分(自東)，狀如暴疾致故，差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。(《全宋文》卷9)信中揭露休若偽造神意，招兵買馬，招降納叛種種罪狀，口語甚多。「莫聲」，即別吱聲，今南方仍用。「潛將往」，即暗地帶走。「見子」，即現有子女。此外，南齊武帝致子弟書及北魏諸帝家書，都通篇口語。

六朝人以古文寫作家書者不乏佳篇。陶淵明《與子儼等疏》是其中代表。那是他五十一歲時寫給五個兒子的信，用平易通暢的文筆，敘述事情，描繪志向，抒寫襟袍。表達了他對孩子的疼愛與負疚之情，流露出歸隱與安貧的矛盾，傾吐自己的個性與志趣。「少學琴書，偶愛閑靜，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，亦復歡然有喜。常言五六月中，北窗下卧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」簡直是無韻的田園詩。林雲銘說：「與子一疏，乃陶公畢生實錄，全副學問也。窮達壽夭，既一眼觀破，則觸處任真，無非天機流行。來以善處兄弟勸勉，亦其至情不容已處。讀之唯見真氣盤旋紙上，不可作文字觀。」〔林雲銘評註《古文析義評估》(台北：廣文書局，1963)，頁14〕王文濡說：「與子之書，佳者難覩，不失之直，即失之浮。淵明詩文善寫性靈，此文敘骨肉之情，尤得性情之真。詞質以達，情真以摯。讀之如涼風忽至，時鳥自鳴。此淵明所獨長，後世奚可企及？」(《南北朝文評注讀本·與子儼疏》第一冊頁60)

宋雷次宗《與子侄書》(《全宋文》卷29)，以古文為主，雜用少量通俗駢句，風格與陶疏略有不同。次宗是著名隱士，兼學儒佛，酷愛山水、不交世務。信中講到他的生活和理想：「吾少嬰羸，事鍾養疾。為性好閑，志棲物表，故雖在童稚之年，已懷遠迹之志。暨於弱冠，遂托業廬山，逮事遠和尚(指慧遠)。於時師友淵源源，務訓弘道，外慕榮夷，內懷排發。於是洗氣神明，玩心墳典，勉志躬耕，夜以繼日。愛有山水之好，悟言之歡，……日月不處，忽復十年，犬馬之齒，已踰知命，崦嵫將迫，前途幾何？遠想向子五岳之舉，近謝居室瑣瑣之勤。及今耄未至昏，衰不及頓，尚可勵志於所期，縱心於所托。棲誠來生之津梁，專氣暮年之撫養。玩歲日於良辰，偷余生於將除，在心所期，盡於此矣。」情感坦誠而不造作，文句整齊而又流蕩，當時和後世均深受讚許。但較之《與子儼疏》，志趣稍嫌消極，不如陶之灑脫，可能是佛家思想影響所致。

南北朝末期，駢文幾乎獨霸文壇。但仍有一些家書追求古樸，雖偶用儷句，但不事藻飾。如周隋之間的韋世康《在絳州與子弟書》(《全隋文》卷9)。世康出身貴戚，歷任顯要，但謹慎清廉，不戀官位。五十來歲就打算引退，寫了一封信與子弟商量。說：「吾

生因緒余，夙治簪纓，馳驅不已、四紀於茲。……今耄雖未及，壯年以謝，霜早梧楸，風光蒲柳。眼闇更劇，不見細書；足病彌增，非可趨走。祿豈須多，防滿則退；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辭。況娘春秋已高，溫清宜奉。晨昏有闕，罪在我躬。……陟山古瞻望，此情彌切。恒山之悲，倍深常想。意欲上聞，氣遵養禮。未訪汝等，故遣及此，興言遠慕，感咽難勝。」雖以四言整齊句式為主，但所選用乃常見詞匯和普通典故，很少雕琢。描述身體衰老和暮年思親心理狀況，具體而微。眼花看不清小字，腳病不能快走，一副老態可掬。表現了北朝文章沈著、剛健、明快的風格，與南朝廷徐委婉的書信有所區別。

六朝家書的駢體，魏晉時期只是偶爾有之，齊梁以後才逐漸增多。

三國時魏應璩《與從弟君苗君胃書》（《全三國文》卷30），是駢文名作。應璩告誡二弟，安於田園生活，進德修業，立身揚名，不必進入仕途。作者先講他「北游」的歡愉和體會，說明脫離「塵囂」能使人得到極大的快樂。然後誠懇地說，自己雖然在官，卻日夜想念故里，效法隱者巢父和孝子曾參，不貪戀富貴，高尚其志，以求天下之至樂。文章多用對偶，句式整齊，音節鏗鏘，詞藻華美，用典精妙而不生僻。如：「逍遙陂塘之上，吟詠菀柳之下，結春芳以崇佩，折若華以翳日，弋下高雲之鳥，餌出深淵之魚。」藝術上已很成熟。明孫月峰評曰：「即淺意稍潤以雅語，風調鏗然，是書記佳作。」清何義門評曰：「志在歸田，自覺有瀟灑出群之慨。」（均見《評注昭明文選》上海：掃葉山房，1923，卷10頁27a，b）

宋鮑照《登大雷岸與妹書》（《全宋文》卷47），駢文而兼賦體。除了開頭和結尾，中間一段全是寫景，以方位為序，描狀環視所見：東西南北如何如何。接下去把視線引向遠方，描繪廬山的雄姿和花江的氣勢，極力鋪陳形容。兼用孫綽《天台山賦》和郭璞《江賦》手法，妙傳難狀之景，歷言形勝之奇，寄情於景，以景抒情，達到了文情並茂的境界。清吳汝綸說它：「奇崛驚絕，前無此體，明遠（鮑照字）創為之。」錢鍾書推為宋文第一。

梁室諸王兄弟之間通信多用駢體。蕭綱有謝東宮賜諸物啟多封。如謝賜裘啟說：「蒙賚豹裘一領，降斯止謗，垂茲信服。物華雉毳，名高燕羽。綱才慚齊相，受白狐之飾；德謝漢藩，均黑貂之賜。地卷北風，庭流花雪。故以裾生惠氣，袖起陽春。」稍後，庾信在北周作《謝趙王賁陸探微畫啟》：「工踰畫馬，巧邁圖龍。試映玉池，即看魚動；還傍金屏，復疑蠅集。史遷暫覩，懸識留侯之貌；漢帝一瞻，便見王嬙之像。」用典巧妙，形容精確。當時和后世許多文人爭相效法。

有趣的是，家書用駢文多出帝王之家，臣民反而少見。曹丕所謂：「父子之間不文」的習慣，後期似乎已被突破。這跟蕭氏父子酷愛文學有意提倡並造成時代潮流有密切關係。以致不僅南朝，連北魏末期也受浸染。宣武帝元恪與叔父彭城王元勰書以及北周諸王書啟皆是駢體。

六朝文人素有模擬之風。最初是擬樂府作思婦寄夫之類情詩，後來有代他人作寄婦

之詩。梁5之際，竟倩朋友以駢文給妻子寫信，顯然不僅僅為了傳達柔情蜜意，同時也是展示詞藻文采。文學之用，竟類租賃，亦一大怪事。如梁何遜有《為衡山侯與婦書》。代貴族蕭恭作與妻書，最善揣摹。梁伏知道有《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》。王寬是梁王朝駙馬，故信中以「玉女」、「秦娥」比其妻。北周庾信有《為梁上黃侯世子（蕭慤）與婦書》（《全後周文》卷10）江陵淪陷後，蕭慤與庾信一同被俘送西魏，而妻子留在南朝。庾信替他寫一封家書，交南使帶回。雖是代筆，但與何遜、伏知道有所不同。由於庾與蕭具有共同的艱難經歷，故表達情感頗為真切，始終充滿夫妻相思和國破家亡，生離死別的痛苦。如：「人非新市，何處尋家？別異邯鄲、那應知路？想鏡中看影，當不含啼；欄外將花，居然俱笑，分杯帳裏，卻扇牀前，故是不思，何時能憶？當學海神，逐潮風而來往；勿如織女，待填河而相見。」清人倪璠說：「此書摹暫離之狀，寫永訣之情，茹恨吞悲，無所投訴，殆亦《哀江南賦》中『臨江愁思』之類也。」〔許逸民校點，倪璠《庾子山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。頁589〕全文僅百餘字，而能作到文氣委婉跌宕，句式變換，手法多樣，敘事抒情，形容比譬兼而用之。幾乎所有典故都抹上悲劇色調，而且冠以否定詞，「未有」、「莫不」、「當不」……加重了絕望心情。最後一段高揚崛起，表示出冲破阻隔，實現團聚的決心。

這類作品當時頗受讚賞，但在後世並沒有太大影響。今天看來，替文化貴族作情書，則實在是於受信對方頗不尊重的文學遊戲。既然「父子之間不文」，那麼夫妻之間又何必玩弄辭藻甚至請人代筆呢？不能不認為，這只是一種扭曲的文化現象而已，理所當然地不像其他家書那樣具有生命力。